

《荒凉山庄》的反智主义与中产阶级子嗣教育

曹彧韬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武汉市，430074；

摘要：伴随 19 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卡莱尔等人为领的反智主义作为浪漫主义的余脉崭露锋芒。反智主义对博雅教育持反对意见，对社会发展整体持悲观态度，其思想在《荒凉山庄》中得到鲜明体现。狄更斯的反智主义与当时中产阶级面临的教育难题密切相关。19 世纪中期青春（adolescence）概念尚未形成，此时中产阶级子嗣的青春教育需承接过去以浪漫主义培育儿童的构想与当世功用主义对成年男子气概的苛求。《荒凉山庄》对社会机器及众多角色的贬讽蕴含着狄更斯未曾言明的对中产阶级青春教育与未来社会的伦理性关注，但这份关注终难鞭辟入里。

关键词：反智主义；智识；《荒凉山庄》；中产阶级

DOI:10.69979/3041-0673.25.05.043

引言

谈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反智主义时，霍顿（Walter E. Houghto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心智结构》（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一书中指出，“中上层社会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生活中包括思辨和艺术成分在内的轻蔑或恐惧，以及培养这种生活的自由主义教育。”（110）这番话点明“反智”乃是知识分子设立的“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张意，226），是对智识这一文化资本的追求。同时，它说明在维多利亚时期，反智绝不只是人们不承认或难以获得智识被迫走上的道路，而很可能仅仅是其他阶层主动选择不去追求智识，是体会并理解智识后将其贬为“未选择的路”。实际上，霍式也指出反智主义难以被清晰定义，因为“作为一种思想，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主张，而是彼此相关的复合体。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Hofstadter，7）。综上，纠结于从哪一角度定义并切入它对我们分析维多利亚时期的反智主义似乎裨益甚少，不如探究反智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征及其缘由和影响。本文正是从此视角出发分析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文章认为，正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对智识及实用性的重新理解导致中产阶级反智主义思潮风行。又因为当时青春（adolescence）概念缺失，中产阶级发现难以承接子嗣童年时期积极浪漫主义及自然式的教育，与成年时期功用主义对成年男子气概的苛求。狄更斯虽敏锐发现这一社会问题，但却只能用一种不痛不痒的伦理教诲试图中和二者矛盾，“只

能重提那些资产阶级学者经常给出的温柔却无用的建议。”（陈后亮，141）

1 浪漫主义的余脉：中产阶级反智主义与《荒凉山庄》

维多利亚时期反智主义的肇始便与新兴中产阶级息息相关。自 18 世纪后半叶始，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使阶级流动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金钱成为了新时代的“上帝”，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而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则说明，工作与物质条件的成功成为了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工作成为了“天职”，因此人们自然更倾向努力改善自身生活，攀爬阶级阶梯。前一世纪中以追求非功利性文化资本为重要标志的绅士风度，在维多利亚社会里则变成阴柔（effeminacy）的象征，被大肆批驳。知识与智识虽作为文化资本，却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回报，难以创造需求与市场，因而乔治亚时代对世间万物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的崇尚在维多利亚时期变得不名一文。霍顿（Walter E. Houghton）指出：以实践之名对理论的蔑视甚至发展到自然科学中，科学成为了“推断性的垃圾，实践与理论毫无关系”（113）。自然科学理论尚且如此，更遑论艺术。

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在《荒凉山庄》中得到鲜明体现。以书为代表的纸质资料为例，若说三十年前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还在“不着痕迹地批评他们的功利主义阅读观”（宁艺阳，50），狄更斯创作时代的人们已然将功用主义视为己归，甚至对书不甚关注了。布里格

斯(Asa Briggs)曾言:“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图书的时代’”(217),书柜是家中最好的装潢;海伦·朗(Helen Long)则指出:早在十八世纪初,“阅读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活动,中产阶级杂志涌现便是明证”(11)。按说工业化生产降低了书本的生产成本,政府对社会教育的关注也逐渐提高了人民的受教育率,书籍作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本应热受追捧,实际却并非如此。在《荒凉山庄》中,书本与作为智识基础的知识已然决裂。首先,狄更斯对书籍的描述只寥寥数语,且颇具负面意义:埃丝特首次来到大法官法庭办公室中看到其“破旧不堪,满是灰尘的桌子,那一堆堆文件及那放满了书的书架。那些书一点也不精致,内容也空空洞洞”(38);塔金霍恩书桌上摆着的也是一些“旧法律书籍”(480)。对智识要求极高的法律从业者尚且让书桌落满灰尘,对其不甚在意,更遑论将书本阅读当作娱乐消遣的上流社会和人民大众了。此外,书中人物对智识及其培养多持否定态度:卡迪认为,只要伴侣和蔼可亲,“那比有学问要好得多”(252);老斯莫尔威德也表示“看报读书没有什么好处。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白白浪费时间。完全是做蠢事”(381),其父亲更是因为在“慈善学校里读书时间用问答方式学过古代亚摩利人和赫梯人的全部历史,所以人们常常引用他来作例子,说明教育的失败”(369);乔治则觉得自己宁愿听从巴格内特太太的意见,“也不愿听那些学者的话”(491)。狄更斯对埃丝特、贾戴斯、莱斯特爵士等人读书的行为也只简略带过,将其刻画为中上层阶级闲适的展演。理查德过去对智识的浪漫主义追求反倒成其桎梏,而狄更斯本人对克鲁克自发燃烧(spontaneous combustion)的坚定辩护也证明其对科学理论不甚关注了解。

此外,卡莱尔、金斯利、麦考雷等人在受智识培养之后,也成为了反智主义的鼓吹者与信徒,因为货币与物质条件已然取代了过去智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整个社会“深陷”反智主义的泥沼之中。在过去宗教伦理道德逐渐崩塌的情况下,信仰危机弥漫社会。人民急需将人生意义依附于某一物件或行动上,因此讲求社交礼仪和行为准则的推荐书籍日渐风行,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Self-Help)一书更是被封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圣经。此类书籍能够风行恰是说明人们愿随波逐流听从书中告诫,虽则能获得一定知识,但却极

大蒙蔽了智识。相较之下,罗斯金(John Ruskin)强调书籍是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宝贵资产,书中充盈着先贤的智慧,人们“若不好好利用它们,便该感到十分惭愧”(5-6)的观点则多少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颇具知识分子的理想旨趣。维多利亚时期的反智主义更应被视作对培根式积极浪漫主义下的智识的反噬与修正,是18-19世纪浪漫主义本身的发展迭代最后的余脉之一。也正是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余脉与积极浪漫主义在儿童的教育上碰撞,使得千万中产阶级家庭为子嗣的青春教育感到棘手与焦虑。

2 中产阶级青春教育与《荒凉山庄》中的男子气概焦虑

在社会反智主义的浪潮之下,培育孩子成为了一个问题。贫民阶层和贵族阶级在这方面与数十年前相比也未有太大变化:贵族生活优渥,不必担心子嗣生计;贫民阶层的小孩仍从小就需劳作以补贴家用,只是工作地点更多改为工厂之中。但对于队伍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言,对后代,尤其是男孩的教育成为了他们的核心关切与焦虑来源之一。一方面,维多利亚社会物欲横流,而孩子在洛克“白板说”的视角下天真无邪,尤其对中上层来说,是伦理道德的化身。另一方面,由于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抚养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男性手中,只有受生计所迫难以顾及体面形象的中下层女性才会考虑外出工作。此外,由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资本积累迅速膨胀,在女性尚未获得财产权的前提下,男性子嗣往往需要子承父业。中产阶级在培育子嗣时需要调和过去卢梭“爱弥儿式”的浪漫主义自然教育与当世功用主义对成年男子气概的苛求。

金凯德(James R. Kincaid)指出,“儿童”这一概念是“在18世纪末发明的,意在占据一个空的心理和社会空间”(11);“我们想象中的儿童,以及为什么这样想象,比儿童本身是什么更为重要”(62)。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到了过去以宗教为领的伦理道德的崩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日常伦理道德的持续侵蚀。因此双分领域概念盛行之时,人们将女性划归家庭中,充当伦理道德的监督与践行者。但这一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角色还不够“天然”,因而“白板”式的未经世俗侵染的儿童填补了人们心理和社会空间中对纯真的追求。如托什(John Tosh)所说:“随着资产阶级工作的异化

状况愈发普遍，儿童的救赎力量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86）。但“儿童”概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于，对于每一个体而言，童年都有其局限期，而社会也有“法定未成年期”（狄更斯，673）。在青春中期，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子嗣将结束其学校教育，转向商业或职业培训，“当时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青春（adolescence）：童年和成年之间的长期过渡几乎没有什么概念”（Tosh，105）。而一旦进入职业培训后，中产阶级的后代们就基本与童年时被准许的浪漫主义生活与智识培养分离了。童年和成年之间过渡期的缺失招致了中产阶级培育后代时莫大的焦虑，对狄更斯本人来说也概莫能外。如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所说，狄更斯在“试图调和（人们对）童年的要求和成年的要求时”（4），刻画出了“成年孩子”（the grown-up child）这一形象。若孩子过分沉溺于浪漫主义式教育，就会变成长不大的孩子，《荒凉山庄》中的斯金波尔和理查德便属于这一范畴；而若从小就一心扑向成家立业这种世俗追求，则会变成老小孩，如书中的小斯莫尔威德、格皮等人。

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男性普遍对自身男子气概感到焦虑：自己是否结婚、家族是否有子嗣、子女教育如何、事业是否成功、妻子是否能展演炫耀性消费与休闲都是对男子气概的检验与佐证。格皮先生多次求婚时坐立不安唯唯诺诺、杰利比先生只被定义为“杰利比太太的丈夫”（45）、巴杰尔先生不断吹嘘妻子过去两任丈夫的事迹，都可看作对自身男子气概焦虑的表征。但斯金波尔和理查德二人却有所不同：从出身上都可视为上流社会成员，前者既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金钱概念，就其家庭生活条件而言，只勉强比贫民阶层好上些许；理查德则失去其原生家庭，即使受表哥贾戴斯监护，其需要选择职业这一点也决定其未来至多停留在中产阶级之中。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童年时都接受了智识与艺术教育：理查德“在公立学校里读了八年书……还学会了好几种体裁的拉丁诗”（216）；斯金波尔则学过医、会弹钢琴，“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艺术”（92）。这种非功利性质的智识教育便是康德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式对美的追求，但这种近乎唯美主义理想化的追求必须以雄厚的经济资本兜底：斯金波尔先生的债务总是由贾戴斯来偿付，而理查德责任与家庭意识的匮乏也最终使其负债累累。斯金波尔虽然能凭其口才和人脉混迹于上流社会，他早已成年有了家室，他人并无义务更无权

力劝其“改邪归正”；但理查德仍处于青春期之中，亟需成家立业、平衡甚至抛弃过去浪漫主义式的幻想。回忆过往的埃丝特对理查德评价道，其急需“扩大自己的学识，要不然就算他在学校读到成年，他这一辈子也只能写写诗而已”（216）。贾戴斯则对其扼腕叹息，认为“他年轻时欣赏他的人们过分重视他的这种性格，而忽视了对这种性格加以平衡、进行调整的训导，所以他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747）。柯林斯（Philip Collins）指出：狄更斯“小说中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物都因此而变得更糟”（194）。似乎在狄更斯心中，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应让儿童接受智识教育，应彻底追随反智主义浪潮，对待子嗣教育的最好办法便是把他扔到世俗当中，“乘年轻把他抓去工作”（Houghton，116）。但文中贾戴斯却明显对斯金波尔的陪伴感到些许欣喜，而完全秉持功用主义的塔金霍恩先生和在纯粹理性指导下建立的衡平法院等国家机器更是狄更斯竭力批驳的对象。颇有意思的是，狄更斯在现实生活中将男性子嗣都送往学校进修，更将大儿子波兹（Boz）送往作为纨绔子弟代名词的伊顿公学，“作为家长的狄更斯似乎与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并无直接关联”（Collins，29）。本文则认为，作为家长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并非毫无关联。在这知行二分之下，其实是狄更斯对社会及中产阶级教育理念伦理性的关注。

3 结语：无关痛痒的伦理关切

当埃丝特、理查德、艾达三人在大法官法院首次见面，即将前往荒凉山庄前，肯奇先生告诉他们“要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夜”（45）。贾戴斯先生此番安排自有其深意：以穷困的杰利比一家为引，揣度三人的伦理心与共情力。当理查德直言杰利比家的孩子“情况全都糟透了”（84）时，贾戴斯以“刮东风了”（84）为借口表达自己对理查德这一评价的不满；而当艾达阐释完埃丝特的善心之举后，贾戴斯又变得喜笑颜开。当埃丝特三人进入贾府后，贾戴斯宣布做他们的监护人，实际已将自己视作他们的代理父亲，将三人的成长教育视为己任。但如托什所说，“养育孩子给父亲带来了双重负担：这对他自身现在的男性地位和未来后代男性气质的体现都有着重大影响”（132）。若父亲与孩子走得太近，或训导过于积极，则有背负“阴柔”骂名的危险。对于贾戴斯与理查德而言，二人既无直接血缘关系，理查德又已年近二十，贾戴斯难以对理查德的教育与未来的职

业规划全权负责,只能穿针引线,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以伦理教诲的力量帮助理查德建构责任意识与事业心。奥威尔(George Orwell)指出,“狄更斯对社会的批评几乎完全是道德层面的”(416),“他的全部‘教诲’乍一看似乎有些陈词滥调:如果(男)人们行为得体,世界就会变得正派”(417)。因而贾戴斯在杰利比家庭问题上对理查德回答的不满也就有了以下逻辑:如果理查德不能在职业上有所建树的话,他未来的妻儿就会面临生存上的危机,而他的家庭也会如杰利比家庭一样分崩离析。也正因此,贾戴斯愿意不厌其烦地帮理查德寻找职业引导人,不断提醒贾戴斯控贾戴斯案于他而言极度危险。

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教诲是文学的本质属性”(12),狄更斯对理查德等人物的设计体现的乃是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教诲;《荒凉山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是个体在反智主义、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衡平法院为主导的宏大叙事下的悲惨故事。书中一众人物都只关注于自身获利或者保全自身的体面形象,而忘记与他人共情,流露最基本的善意。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批判社会追捧的反智主义及对智识的不齿便有了新的含义:培养智识即是培养非功利性的善与美、培养人们的共情能力,有助于实现社会大同。也正因此,狄更斯哪怕将自己的后代送往公学专研文史哲,也不愿他们过早进入腐朽的商业社会。《荒凉山庄》中的反智主义与中产阶级青春教育最终都指向狄更斯未曾言明的伦理思考与伦理关切,但这种教诲终究无关痛痒,是狄更斯创作和教育理念中的败笔之一。

参考文献

- [1]Andrews,Malcolm.Dickens and the Grown-up Child.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
- [2]Briggs,Asa.Victorian Thing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 [3]“Charles Dickens”,by George Orwell in 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

rge Orwell,edited by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68.

- [4]Collins,Philip.Dickens and Education.Palgrave Macmillan,1963.

- [5]Houghton,Walter E.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 [6]Kincaid,James R. Child-loving:The Erotic Child and Victorian Culture.Routledge,1992.

- [7]Long,Helen C.Victorian Houses and their Details.Architectural Press,2002.

- [8]Ruskin,John.Sesame and Lilies.Dodo Press,2007.

- [9]Tosh,John.A Man's Place: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 [10]Tosh,John.Manliness and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Routledge, 2016.

- [11]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主万,徐自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 [12]陈后亮,宁艺阳。阅读与社交:《傲慢与偏见》中的功利主义阅读文化。外国语文,2019,35(04):50-56.

- [13]陈后亮。“一个另类种群”:《雾都孤儿》中的犯罪阶级想象。外国文学评论,2017(03):141-156.

- [1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胡翠娥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

- [1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32(01):12-22.

- [16]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曹彧韬(2000.6-),男,汉族,湖北襄阳人,硕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